

日本外交的选择：概念、议程与方向

张 勇

摘 要 外交是以和平方式实施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战败后，以吉田茂为首的日本政治家基于对国家特性的重新认知，确立了以全力发展经济、轻军备及对美协调三大原则为主要内容的“吉田主义”，为日本描绘出复兴的蓝图。在宪法的“和平主义”精神及外交本质的合力之下，日本外交得以挣脱战前的扩张路线，在摸索中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其主要特征，则系于“宪法九条”、“日美同盟”、“经济中心”与“历史遗产”四位一体。其中，“宪法九条”与“日美同盟”这两大选择的目标、路径与方法并不相同，因此也屡遭质疑与局部修正，但“吉田主义”凭借其内在的强韧性，即使在冷战后依然维持了整体结构上的相对稳定。然而，这一局面在第二次安倍执政时期发生了急剧变化，日本外交的和平主义精神正经历实质性考验。日本明显加快了战略转型的步伐，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突破既有思维、法制及惯例的框架，外交体制也在经历重大调整。这一总体战略形态及外交体制的变化，无论对日本自身，还是对亚洲各国，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涵。展望未来，能否真诚反省历史，致力国际协调，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将是日本外交所面临的“世纪性”课题。一个不甘衰落而积极挑战自己的日本，如何融入日新月异的亚洲？面对新的历史机遇，日本须减少战略误判，戮力合作。没有健全的亚洲外交，日本外交难有未来。

关键词 日本外交 吉田主义 安倍路线 和平主义 日美同盟 中日关系

* 张勇，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07）。

自第二次安倍内阁以来，日本明显加快了对外战略转型的步伐，在一系列关键性问题上突破现有思维、法制及惯例的框架，决策机制也在相应地经历重大调整。应当说，日本这一总体战略形态及决策机制的变化，无论对其自身，还是对周边各国的和平与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涵，值得长期关注与研究。^①

外交，是实现国家对外战略与政策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在日本对外战略急剧转型的背景下，日本外交向何处去？在战败已逾70年这一历史时刻，日本的学界与政界正在继续一系列源于二战后而在冷战后又再度兴起的、具有根本性且极富启示意义的外交大讨论，核心是追问外交本质和探寻日本特质，以“重构日本外交”^②为目标，酝酿与规划新的议程与方向。

这一理论与政策议程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二战后，以吉田茂为首的日本政治家们在无奈中选择了“拥抱战败”。在“和平宪法”之下，基于对国家特性的重新认知和对战败历史的反省，确立了以全力发展经济、轻军备以及对美协调诸原则为主要内容的“吉田主义”，为日本描绘出了再度崛起的蓝图。随着冷战走向终结，美、日、西欧一度以“胜利者”的姿态力图在国际秩序运营中发挥领导作用。凭借战后长期蓄积的经济实力，日本意欲扮演全球性大国，发挥领导能力。当时的日本外交决策者与研究者，曾有过“日、美、欧三极”的远大抱负与政策蓝图。但是，随着政治的“漂流”与经济的“退潮”，日本陷入了“失落的二十年”。从国家到社会，从精英到大众，充斥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的“丧失感”。^③以安倍为代表的日本决策层试图通过改革“僵化”的政治、经济、外交与军事体制来构筑国家“大战略”（grand strategy）^④，其核心目标是谋求挣脱以“吉田主义”为代表的“战后体制”，最终实现日本在经济、外交乃至军事上的“全面大国化”。

推而广之，这一理论与政策议程的“辐射效应”也超越狭长的日本列

① 张勇：《日本战略转型中的对外政策智库》，《外交评论》，2015年第6期，第139—164页。

② 日文是“日本外交の再構築”。“再構築”，可直译为“再构筑”，也可使用中文语境中的“重建”或“重构”。文中使用“重构”一词，是鉴于“重建”推倒重来的意味更强，“重构”则在更大程度上指在新的国际秩序及国内体制转型的背景下，外交研究者、外交决策者基于发展的理念，对本国外交予以重新排列组合，使之更加符合自身诉求。

③ 酒井哲哉編『日本の外交 第3巻 外交思想』、岩波書店、2013年、刊行にあたって第v頁。

④ 所谓大战略，即一国为维护与拓展其国家利益，动员本国及其盟国所有能够利用的政治的、外交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心理的及其他各种力量，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内外环境的科学与技术。这一界定，借鉴了日本国际论坛理事长伊藤宪一对“大战略”的定义。参见伊藤宪一：《国家与战略》，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0页。

岛，具有更广泛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日本自战后以来跌宕起伏的外交实践，为国际外交研究提供了无比生动的“样本”。同时，尽管日本国力呈现衰微之态，但仍是世界性的经济大国，也是亚洲关键性的一员。^① 一个不甘衰落而积极挑战自己的日本，如何面对日新月异的亚洲，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命题。亚洲的和平与发展，需要日本减少战略误判，戮力合作。另外，作为中国之重要邻国，其外交探讨与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无论借鉴，还是警觉，抑或是应对，都需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对日本外交转型^②的研究力度。

一、外交内涵与日本外交特质

外交与人类文明历史同样古老。自有人类以来，独立群体间的和平交往总是要求某种代表性的活动，这种活动逐渐发展成了人们熟悉的外交。我国古代就有“外交”，包括与日本的外交。古汉语中的“外交”、“外事”、“通事”、“交通”、“交好”、“朝覲”、“聘问”等尽管与今天我们所讲的“外交”有所不同，但都具有“外交”的某些意涵。现代意义上的“外交”一词不仅在中国出现甚晚，西方国家亦复如是。^③

外交学研究代表人物之一、英国莱斯特大学外交研究中心教授杰夫·贝里奇认为，外交在其现代形式里仍然保留了广泛的固有特性，并由此而产生了新兴的外交专业，像所有专业一样，外交也衍生出了自己的专业术语和逻辑规范。^④

外交是什么？正如贝里奇所指出的那样，“有多少作者就有多少种定义”^⑤。我国学者就此认为，“对外交的定义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关键是这种定义能否更加有助于解决新的外交问题或理解老的外交问题”。^⑥

哈罗德·尼克尔森的《外交》，在国际外交界享有盛誉。1968年9月30日，由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斋藤真等学者译为日文出版。^⑦ 尼克尔森指出，

① 按照日本庆应大学教授细谷雄一的界定，尽管面临挑战，但日本仍是当今国际秩序的主要角色之一。参见：细谷雄一「国際秩序——18世紀ヨーロッパから21世紀アジアへ」、中央公論新社、2013年、まえがき第iii頁。

② “外交转型”，是指由战略、政策、体制、手段等组成的总体特征从一种基本类型向另一种基本类型的转变。

③ 参见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前言，第1—3页。

④ 杰夫·贝里奇、艾伦·詹姆斯：《外交辞典》，高飞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序言1。

⑤ 杰夫·贝里奇：《外交理论与实践》，庞中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

⑥ 陈志敏等：《现代外交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页。

⑦ ハロルド・ニコルソン『外交』、齋藤真、深谷満雄訳、東京大学出版会、1968年。

“外交就是用谈判的方式来处理国际关系，是大使和使节用来调整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方法，是外交官的业务或技术”^①。另外，同样经典的《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第五版）一书认为，“外交是运用智力和机智处理各独立国家的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有时也推广到独立国家和附庸国家之间的关系；或者更简单地说，是指以和平手段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事务。”^② 萨道义对外交的见解，和我国许多学者的观点较为类似。如外交家黄金祺称，“国家以和平方式通过正式代表国家的行为在对外事务中行使主权，以处理与外国关系，参与国际事务，是一国维护本国利益及实现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不同的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决定一国外交的不同性质、内容和特色，形成不同形态的外交。”^③ 针对新时期外交的特点，他指出“总体外交”应包括“大外交”与“小外交”。“小外交”指的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系统所从事的外交；“大外交”则可包括一国政党、议会、军事、经济、文化、科技、体育等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部门以及民间各个领域，旨在促进国家间关系和以主权国家为主体所进行的一切“心中有国”的对外交往。^④

日本学界是如何界定外交的呢？较为权威的辞典《广辞苑》（第五版）将外交定义为“与外国的交际；用谈判的方法处理国际事务。”日裔美籍历史学家、曾任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入江昭教授在其所著的《日本外交》中，提倡应“体系化”定义外交。入江认为，外交的内涵是：（1）外交决策。包括决策者对国际形势的认知、对国家利益的界定以及考虑政策选择的限定因素；（2）政策执行。包括政策的表现形式、获取舆论支持以及实际的对外谈判、协定等的技术；（3）政策评价。包括是否达到政策目的、决策者所认知的国际环境与现实的罅隙以及政策对国际环境的影响。此外，入江主张国家利益至少应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即军事（国防）、经济（贸易、投资）、思想（道德的考虑、国家威信与地位等）。^⑤ 已故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

^① 英文版参见 Harold Nicolson, *Diplom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p. 15; 日文版参见ハロルド・ニコルソン『外交』、第7頁。

^② [英] 戈尔—布思主编：《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第五版），杨立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3页。值得说明的是，欧内斯特·萨道义（Sir Ernest Satow）曾常驻日本20载，这段经历对其外交观念有很大的影响，1895年至1900年还曾担任英国驻日公使。

^③ 钱其琛主编：《世界外交大辞典》，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2045页。

^④ 黄金祺：《外交外事知识和技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

^⑤ 入江昭『日本の外交——明治維新から現代まで』、中央公論新社、1966年、第168—170頁。遵循对外交定义的这一“体系化”的界定，1991年入江又出版了《新·日本外交》，感兴趣者请参见：入江昭『新·日本の外交——全球化時代の日本の選択』、中央公論社、1991年。

坂野正高认为，外交是对等的独立国家间关系，它不是纵向关系，而是横向关系。^① 冷战结束前夕，由日本一线学者合作完成的《讲座国际政治》系列丛书认为，外交主要指国家间对话，特别是外交谈判。外交谈判分为两类，一是国家为达成对外政策目标所采用的手段，二是在国家间对话中相互作用、寻求共识的过程。尽管外交与“外交政策”、“对外政策”存在差异，但在实际使用上往往不加细分。^② 日本庆应大学教授细谷雄一在其所著《外交》中，将外交定义为，为促进主权国家基于国家利益、安全与繁荣，促使国家间建立更加稳定、友好的关系，政府间进行的交涉或宣示政策的言辞。^③ 原驻德国大使、现任关西学院大学副校长的神余隆博认为，外交=国家利益的实现+国际协调的达成+国家与国民尊严的确保。^④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主体和外交议程双重多元化的背景下，固守常规的外交定义既不能反映各国外交实践的现实，也妨碍外交决策和执行者充分调动国家的各种资源和渠道去实现国家的总体对外政策目标。^⑤ 因此，外交概念的适度广义化有其必要，亦不可避免。但也应看到，正是由于古今中外外交界人士“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沉淀”，外交学才得以走到 21 世纪的今天。尽管外交所涉及的行为主体及范围变得越来越丰富，但其内涵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之所以详细考证中外有关外交的定义，目的在于从比较中归纳外交这一自古以来就有而在近两百年才逐渐规范的重要国家职能的本质属性。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外交的本质属性是“和平”，包括和平的目标及和平的手段。也就是说，一国外交人员在实施对外交往行为时，其核心目标应是为了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所采用的主要手段也应是和平的。针对这一特性，在我国学者张清敏看来，“外交是以和平方式实施国家对外政策的工具，其和平本质决定了外交手段与军事手段的根本不同。”^⑥ 除了和平的属性，外交有其明确的“发展”属性。这里所指的“发展”有两层含义：外交作为主权国家行使的重要职能之一，在维护甚至是主动缔造和平时，也应

① 坂野正高『現代外交の分析——情報・政策決定・外交交渉』、東京大学出版会、1971年、第9頁。

② 有賀貞など編『講座国際政治②外交政策』、東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第1—2頁。

③ 細谷雄一『外交——多文明時代の対話と交渉』、有斐閣、2007年、第15頁。

④ 神余隆博『多極化世界の日本外交戦略』、朝日新聞出版、2010年、第68頁。

⑤ 陈志敏等：《现代外交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6页。

⑥ 张清敏：《外交的本质与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外交评论》，2016年第4期，第1页。

注重本国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另外，作为连接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最重要的“介质”，随着国际国内对外交诉求的增加，外交在保持自身特性的同时，还应与时俱进，谋求自身的发展与完善。和平属性与发展属性，是当代外交的两个“车轮”，不可或缺。致力和平，服务发展，应当成为外交政策界与研究界的共识。而且，实现本国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应坚持“国际协调”，即通过协商与合作的方式，与对方积极沟通。在当今时代，“国际协调”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外交旨在达成国家的对外政策目标，以最终实现国家利益。但目标与利益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正如汉斯·摩根索在其名著《国家间政治》中所认为的那样，在必要的范围内降伏而不是摧毁对方的意志，以求维护自己的重大利益而又不损害对方的重大利益；外交政策的方法并不是通过摧毁自己道路上的障碍求得前进，而是或者在这些障碍面前后撤，或者施计克服这些障碍，或者用计迂回地绕过它们，或者借助说服、谈判和压力逐渐软化和瓦解它们。所以，外交官的头脑是复杂而敏锐的，把眼前的问题看作是历史的瞬间，它超越明天的胜利，预见到未来无以数计的可能性。^①

战后日本外交，是在《日本国宪法》（1946年11月3日颁布，1947年5月3日施行）之下展开的。^②基于对战前军国主义的排斥与反省，其第九条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因这一浓郁的“和平主义”期许，《日本国宪法》也被称为“和平宪法”。1957年9月，日本外务省第一份外交蓝皮书——《我国外交近况》问世，提出作为战后日本外交基轴的“外交三原则”。^③1958年3月出版的《我国外交近况（第2号）》明确称：“日本的国是，当基于自由与正义，确立与维持和平。遵循该国是，推进和平外交、实现国际正义，在国际社会确立民主主义精神，这是我国的根本精神。而‘外交三原则’是实现根本精神的重要手段。”^④

① 汉斯·摩根索著、肯尼斯·汤普森、戴维·克林顿修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徐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89页。

② 河野洋平「日本外交への直言——回想と提言」、岩波書店、2015年、第192頁。

③ 外務省「わが外交の近況」、1957年9月、日本外務省、<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57/s32-1-2.htm#a>。

④ 外務省「わが外交の近況（第2号）」、1958年3月、日本外務省、<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58/s33-1-2.htm>。

应当说，宪法的这一精神，与日本外交的最根本属性两相契合。战后，日本正是在宪法的“和平主义”^①精神及外交本质的合力之下，开启了外交的航程，经过艰难摸索得以走到今天。

由于其独特的战败国身份，战后日本外交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诸多备受诟病之处。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自第二次安倍内阁上台后，日本国内修宪言论与动向日趋抬头。日本正在摸索“正常国家”目标下的“积极和平主义”。在“和平主义”之前特别加上“积极”这一定语，自有其深意。安倍外交智囊、知名学者北冈伸一认为，作为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理念，安倍所提出的基于国际协调主义的“积极和平主义”，改变了过去信奉“日本的非军事化越彻底，世界越能够和平”的“消极和平主义”。^②正是在该逻辑之下，2012年之后安倍内阁先后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国家安全战略》，修改《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废除现行“武器出口三原则”，制定《特定秘密保护法》，解禁集体自卫权，时隔18年再次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以及强行通过新安保法，使日本安全政策迎来重大转折。下一步，安倍计划延长总裁任期，借“积极和平主义”助推修宪，以完成既定战略目标。

在这场备受关注的战略转型进程中，日本外交将走向何方？本文拟通过系统探讨战后宪法下与日本外交相关的研究、政策与体制，剖析其逻辑与机理。更为重要的是，聚焦正在“重构日本外交”的新动向，分析其核心议程，归纳今后日本外交相对可能的战略走向。

二、日本外交的研究“进化”

从战败后至今，对日本来说，如何避免重蹈战争覆辙以及与世界沟通合作成为重要课题之一。日本外交学者立足不断变化的时代，从本国视角出发取得了诸多理论性成果。此外，不少现役与退役外交人员著书立说，同时也

^① 和平主义（Pacifism）“是一种信仰，它认为一切战争都是错误的，不论它所为之而战的理由是如何的好，也不论它给一个国家造成的威胁是什么”。参见邓正来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思想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09页。

^② 参见北冈伸一「積極的平和主義」に転換する日本の安全保障政策」、<http://www.nippon.com/ja/currents/d00108/>。

较为注重接受外交研究者的“口述史”性质的深度访谈，基于自身直接、丰富的外交体验，总结日本的外交理论与外交实践，为完善本国外交积极建言。按照研究方法、路径及具体内容的差异，可将战后以来日本学者对“日本外交”的研究成果分为三类：外交理论研究及方法论指导下的案例分析；日本外交史研究；现役与退役外交人士回忆录及口述史访谈。

第一类，日本外交理论研究及方法论指导下的案例分析。战后日本对外交理论的系统性研究，首推坂野正高撰写的《现代外交分析》。该书于1971年出版，经数度增印，直到2013年仍再版发行。坂野深受弗朗索瓦·德·卡利埃（François de Callières）与尼克尔森这两位古典外交重要奠基者的影响。^①两人既是欧洲历史上著名的外交实践者，也是外交学领域的思想家，他们在欧洲外交实践的基础上创建和丰富了外交学的理论和思想，推动了外交学学科的形成。^②在《现代外交分析》一书中，根据日本经济腾飞期不断扩大的外交实践所提出的时代性要求，坂野集中围绕外交中的信息、决策与谈判，全面论述了日本外交官的历史起源及常驻外交官制度；通过国际比较，分析了日本外务省与同为议会内阁制领导下的英国外交部的异同；将信息处理细分为收集、分析与综合三大阶段；区分了内阁的外交决策与决策中外务省的作用；关注外交与内政，总结了外务省与其他诸省厅、非政府机关的关系；将外交谈判分解为通常的外交途径、国际会议、首脑会议等途径，并分析了决策与谈判的关系；将外交置于“民主统治”的范畴下，明确提出外交应在议会、舆论及文官统治之下。除《现代外交分析》之外，还有不少较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如细谷千博编《对外政策决定过程的日美比较》（1977）、渡边昭夫著《战后日本对外政策》（1985）、有贺贞等编《讲座国际政治④日本外交》（1989）、有贺贞等编《讲座国际政治②外交政策》（1989）、佐藤英夫著《对外政策》（1989）、五百旗头真著《秩序变革期日本的选择》（1991）、绪方贞子著《战后日中·美中关系》（1992）、花井等著《新外交政策论》（1998）、外交政策决定要因研究会编《日本外交政策决定要因》（1999）、樱田大造编《比较外交政策》（2004）、信田智人著《官邸外交》（2004）、添谷芳秀著《日本的“中等国家”外交》（2005）、信田智人著

^① 卡利埃的《外交谈判法》由坂野正高翻译，1978年1月17日出版。参见：カリエール『外交談判法』、坂野正高訳、岩波書店、1978年。此外，在坂野所著《现代外交分析》的扉页上，还特意引用了尼克尔森《外交》一书中的名言。

^② 张清敏：《外交的本质与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第3页。

《冷战后日本外交》(2006)、细谷雄一著《外交》(2007)、原贵美惠编《“在外”日本人研究者眼中的日本外交》(2009)、日本外交编辑委员会合编的《日本外交(1—6)》(2013)、川崎刚著《作为社会科学的日本外交》(2015)、武田悠著《“经济大国”的日本对美协调》(2015)、白鸟润一郎著《“经济大国”的日本外交》(2015)、增田弘编《战后日本外交思想》(2016)、添谷芳秀编《秩序变动与日本外交》(2016)等。这些成果中的绝大多数,均为各个时期的优秀作品,也已成为日本外交学研究的核心文献。

第二类,日本外交史研究。与第一类成果相比,日本学界对外交史的研究尤为可观。如入江昭著《日本外交》(1966)、池井优著《日本外交史概说》(1971)、入江昭著《新·日本外交》(1991)、细谷千博著《日本外交的轨迹》(1993)、大畑笃二郎著《日本外交史》(1996)、佐道明广等主编《从人物看日本外交史》(2008)、五百旗头真主编的《战后日本外交史》(第三版,2010)、井上寿一著《日本外交史讲义》(新版,2014)、宫城大藏著《现代日本外交史》(2016)等。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已故一桥大学法学部教授细谷千博所著《日本外交的轨迹》。该书将近代以来的日本外交分为两大阶段:近代日本外交的展开与战后日本外交的构图。细谷用凝炼且优美的文字,描绘了自1853年到1992年这激荡的近140年的日本外交。细谷认为,在第一阶段,作为后发国家,日本自开国后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经过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胜利,成为国际承认的亚洲强国。同时,日本作为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积极参加领土与权益的争夺。经过一战,成为世界性的大国,开始往军国主义一侧倾斜,终尝败果。战后度过占领期,签署旧金山和约后方恢复“独立”;第二阶段,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急剧调整,“独立”后的日本外交特性也发生变化。但是其基本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存在“不变”之处。因此,日本外交研究者应注意分析这些“变”与“不变”的断绝与连续。^①

第三类,现役与退役外交人士回忆录及口述史访谈。前两类多为学者所作,以理论分析与历史分析见长。第三类则具有鲜明的特色,外交官们的作品,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因作者参与外交政策制定及执行,字里行间浸透着“现场感”。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西春彦著《回想日本外交》(1965)、斋藤镇男著《外交政策史论序说》(1981)、安倍晋太郎著《着眼创造性的外交》

^① 参见细谷千博「日本外交の軌跡」、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93年。

(1984)、下田武三著《战后日本外交的证言》(1984)、浅井基文著《日本外交》(1989)、斋藤镇男著《外交》(1991)、小原雅博著《国家利益与外交》(2007)、大江博著《外交与国家利益》(2007)、平林博著《首脑外交力》(2008)、田中均著《外交力》(2009)、田中均著《职业外交力》(2009)、神余隆博著《多极化世界的日本外交战略》(2010)、兼原信克著《战略外交原论》(2011)、中岛琢磨等七名一线中青年学者采访整理的《中曾根康弘谈战后日本外交》(2012)、冈崎久彦著《国际形势判断》(2015)、栗山尚一著《战后日本外交》(2016)等。栗山的《战后日本外交》则是其中的佼佼者。栗山于1954年进入外务省,1996年辞职,曾任外务省事务次官,是“战后日本外交”的主要参与者之一。该书由栗山本人精选于日本《亚洲时报》连载的专栏文章构成,他坦承,开设专栏“有其野心”,也就是说想“从外交官的视角来回顾战后半世纪,对日本外交政策进行评价”。栗山称,欲确立将来的方向,不能缺少对过去的检证。安倍政权强调“摆脱战后体制”,但其内容并不明确。过去半个世纪日本外交的遗产,也同样是“战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内政策不同,栗山认为评价外交政策非常困难。对外交政策来说,其他主权国家也有各自的政策目标,这必然需要双方做出某种程度的妥协。外交交涉的本质是非强制性。有时,为达成目标会辅之以强制手段,但这只是例外。^①冷战结束后,日本外交界人士“官而优则学”的现象值得关注,不少人被各大高校及智库聘任。

“进化”一词,在这里特指日本外交界对本国外交的理论研究与政策分析的发展变化。通过对上述三类成果的梳理,可以发现“进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外交研究者及成果日益丰盈和深入。恢复“独立”后,特别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变动愈加复杂,国际问题渐趋多样化,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增大。正如日本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二战后日本顺应国际环境以求发展,如今日本的行动,深受国际社会动向之影响。对日本而言,国际问题不仅仅会成为国内问题,国内问题也渐渐国际问题化。”^②日本学界也呼应这种状况,对外交问题的关注度明显提升。一些大学新设与国际关系、外交学相关的学部与学科。冷战结束后,学界对外交的研究发展显著,成果渐趋增多。研究者在著书立说之余,还积极译介外交学经典著作。

^① 参见栗山尚一「戦後日本外交 軌跡と課題」、岩波書店、2016年。

^② 有賀貞など編集「講座国際政治④日本の外交」、東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刊行にあたって第i頁。

除了尼克尔森的《外交》及卡利埃的《外交谈判法》，美国前国务卿、外交家亨利·基辛格的《外交》^①，在日本也被誉为20世纪外交学名著之一，1996年由曾为安倍智囊、已故知名外交家冈崎久彦监译出版。较为经典的译作还有《日本外交政策》^②、《外交中的政策决定》^③、《决策的本质》^④等。这些经典著作对日本的外交学研究产生了重要且深远的影响。第二，对日本外交研究的逐步深化与细化。在研究方法上，针对日本外交学界理论与实践日益脱节的状况，注重“从理论与实践的对立到统合”，要求既使用有解释力的框架与工具分析日本外交现象，又兼顾权威资料与核心文献的著作开始出现。^⑤对国家利益的认知也变得更为全面。如上文所述，入江昭从军事、经济、思想三维度对国家利益进行了界定。原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审议官、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小原雅博在其所著的《国家利益与外交》一书中则认为，尽管国家利益依然对外交政策产生重大影响，但在由领土、国民、主权三大要素框架基础上形成的“国家利益”这一概念本身已经不符合时代的潮流。因此，小原主张应倡导“开放的国家利益”，即在国际社会的变化中，国家应该充分理解在“权力”作用的前提下，通过外交手段寻找相互“折中”的平衡点，促进和平与繁荣这一共同利益。此外，在外交中的安全问题研究方面，已经涵盖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特别是强调“人的安全”。

在新形势下，为实现对外目标，争取本国国民对外交政策的广泛理解愈发不可或缺。有观点认为，日本外交最大的使命，在于唤起国民对外交的认知与理解。在这方面，日本外交界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一本权威外交杂志的命运沉浮，恰如其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2010年3月，外交与国际关系专门杂志《外交论坛》^⑥宣布休刊。该杂志创刊于日本“泡沫经济”鼎盛期的1988年，累计出刊261期。作为日本外交界唯一的“准官方”舆论阵地，《外交论坛》以汇众人之智，探求“世界中的日本”为办刊宗旨，吸引了国内外知名人士特别是外交官们的关注与

① ヘンリー・A. キッシンジャー『外交（上下）』、岡崎久彦監訳、日本経済新聞社、1996年。

② I. ニッシュ『日本の外交政策（1869—1942）：霞が関から三宅坂へ』、宮本盛太郎訳、ミネルヴァ書房、1994年。

③ J. フランケル『外交における政策決定』、河合秀和訳、1970年。

④ グレアム・T. アリソン『決定の本質——キューバ・ミサイル危機の分析』、宮里政玄訳、中央公論新社、1977年。

⑤ 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参见：川崎剛『社会科学としての日本外交研究：理論と歴史の統合をめざして』、ミネルヴァ書房、2015年。

⑥ 《外交论坛》分日英两个版本，即：「外交フォーラム」（日文版）、Gaiko Forum（英文版）。

投稿。因其权威性与可读性，加上在学术性与政策性上独具匠心的设计，《外交论坛》成为国内外日本外交研究者了解日本外交的必读刊物之一。有鉴于此，获悉停刊消息后，北冈伸一发表反对声明，认为《外交论坛》的窘境，代表了日本国民“对外交政策理解与信赖的降低”。^①

《外交论坛》的境遇，引发了日本外交研究与政策界的思考。在不断建言及运作之下，2010年9月，外务省发行的《外交》杂志创刊。在政府财政紧张的情况下，《外交》继《外交论坛》停刊后于同年出刊，一定程度上也引发了争议。在回答国会议员的质询时，时任首相野田佳彦认为“为深化对日本外交的理解与信赖，向国内外普及相关知识的外交专门杂志自有其存在的重要价值”。^②在发刊词中，时任编辑委员长、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渡边启贵称：“我们的意图是促进人们对日本外交现实的理解，汇集真挚的外交讨论。”^③《外交》发展了《外交论坛》的办刊思路，在卷头随笔、特集、访谈、书评及日本外交动态的基础上，更加突出对重大选题的策划，注重对关键外交人物的访谈，不定期开设外交建言专栏，呼应日本外交界的研究与政策动态。如创刊号的选题是“世界新秩序与日本的方向”，约请美籍日裔学者、斯坦福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等美、法、日知名学者撰文；另请日本智库界代表人物、日本国际论坛理事长伊藤宪一等就民主党政权“开局之年”的外交进行梳理；在外交建言专栏中，经济界、文艺界及诺贝尔奖获得者分别对日本经济外交、文化外交及日本人的“国际感觉”积极建言；而在特别采访栏目《日本外交的诀窍》中，访谈对象则是日本前首相、至今仍活跃在智库界的中曾根康弘。截至2016年7月，《外交》共出版38期，选题涵盖日本外交的方方面面，描绘了日本外交的“立体化”图景。^④

从学科发展上看，日本国内的外交研究特别是对“日本外交”的研究在

① 「「外交フォーラム」休刊 日本唯一の専門オピニオン誌」、「朝日新聞」、2010年2月25日。

② 参见：内閣総理大臣野田佳彦「答弁本文情報」、http://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shitsumon.nsf/html/shitsumon/b178030.htm。

③ 渡边启贵「「外交」创刊にあたって 動け、日本外交——新しい現実主義への挑戦」、「外交」Vol.01（创刊号）、2010年9月、第4頁。

④ 特集选题诸如：战后70年——历史与外交、战后70年的构图——日本外交“生与死”的起点、日本外交——未知与遭遇、再启动——安倍首相的挑战、日本战略外交的死角——非洲、新开发合作与日本外交战略、美国衰退论的神话与现实、美国的实像与日美同盟、日中和解40年的歧路、如何与中国共生、海洋时代的外交构想力、变动世界的势力均衡与日本安全、“积极的和平主义”与日本安全、日本防卫政策、文化外交与软实力等。

逐步“进化”，这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与此同时，日本的外交研究仍存在困境，在诸多地方并未如人意。首先，与外交史研究相比，理论化的研究成果居于明显弱势地位。冷战后，外交学科取得较大发展，但是以学问为目的的外交研究，特别是对外交的理论研究非常弱。^①因此，有学者提出为迎来日本外交学的“复兴”，应借鉴英国经验，将外交学作为独立的研究体系。其次，“不成熟”的日本外交实践制约外交学科发展。在日本学者看来，战后日本外交高度依赖美国，这造成了外交思考空间的狭小。日本长于一对一的双边外交研究，对多边外交、国际组织外交、整体外交以及战略外交等关注并不充分。再者，扎实的外交研究，既需要政府方面提供权威、时新的信息，又需要有涉及特定研究对象的“解密档案”。尽管日本有《信息公开法》，但政府对公开档案仍显谨慎，这必然会制约外交研究的活跃度。最后，外交具有高度的政治性，作为专门研究外交现象的外交学也受其影响。日本学界的外交研究，毕竟是从日本视角出发，为本国国家利益服务的。在日本追求成为“正常国家”的大潮中，在日本社会总体保守化的背景下，其日本视点也有较强的针对性。特别是冷战后日本外交学界，与所持的理想主义相较，更加强调以现实的立场应对国际环境带来的变化。有鉴于此，依据外交的和平、发展与协调的本质属性，不断进行研究“校准”，愈发有其现实意义。

三、战后日本外交路线：“吉田主义”及其遗产

二战之后，满目疮痍的日本迎来了自明治维新后对外战略的再度转型，整个国家转而调整方向，张开臂膀“拥抱战败”。这一时期的日本外交，既继承了日本历史上和明治时期以来的一些传统特征，又具有经过战后改革和深受美国影响的一些新变化，同时也为冷战后日本外交的嬗变奠定了基础。对战后时期的日本外交进行分析，不仅是揭示“日本型”外交特点的重要途径，也是把握当前和未来日本外交走向的一项重要前提。

日本在对外武力侵略路线彻底破产后，基于反省战败历史（即日本何以战败，简称反省历史）的前提下，形成了依循“宪法九条”所规定的和平发展路线，在外交与安全领域高度依赖美国，以经济外交为主要手段的战后外

^① 細谷雄一『外交——多文明時代の対話と交渉』、第10頁。

交，即“历史遗产”^① + “宪法九条” + “日美同盟” + “经济中心”，是为二战后日本外交的主要特征。^② 由于对“历史遗产”及“经济中心”的认知在战后较长时期已成为主流（尽管两者程度或有不同），因此战后日本外交及战略论争主要在“宪法九条” + “日美同盟”（亦即添谷芳秀所提出的“九条安保体制”^③）框架下展开。围绕是否修改宪法第九条以及坚持还是摆脱日美同盟这两大根本问题，日本各界都在寻找自己心中的坐标（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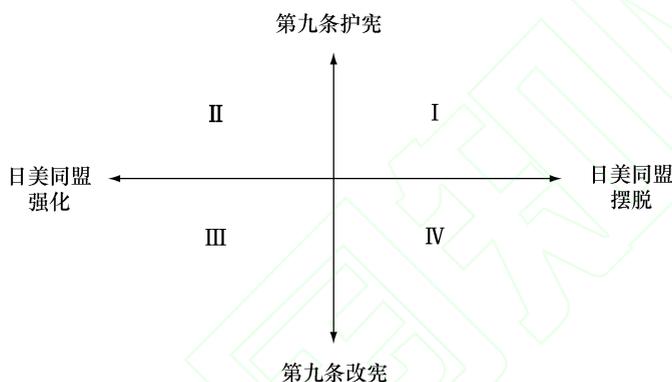


图-1 九条·同盟体制^④

① 原外务省中国课课长、东京大学教授浅井基文认为，“过去的遗产”有两层含义：（1）二战前，作为军国主义的日本对东亚各国施加的人、物、精神损害及与之相伴的后遗症；（2）战后日本基于上述损害与后遗症对受害国及国民所负的责任。参见：浅井基文『日本外交——反省と転換』、岩波書店、1989年、第25頁。

② 日本神户大学名誉教授五百旗头真认为，由吉田茂首相所开创的经济中心主义路线，为实现“安全”和“繁荣”，抛弃了战前偏重军事的国家政策，强调以产业和贸易立国，将重建后的日本打造成为通商国家。正因如此，吉田曾消极对待早期重整军备，并将冷战下的安全保障，以《日美安全条约》的形式全盘托付于美国。日本庆应大学教授添谷芳秀明确认为，战后日本外交是在“九条安保体制”框架下展开的，亦即“宪法第九条”与“日美安保体制”。浅井基文则认为，战后日本外交的基本特征是彻底的亲美路线与“过去的遗产”的桎梏。主要参见：五百旗头真编『戦後日本外交史（第3版）』、有斐閣、2010年；添谷芳秀『日本の「ミドルパワー」外交——戦後日本の選択と構想』、筑摩書房、2005年；浅井基文『日本外交——反省と転換』。

③ 参见添谷芳秀『安全保障を問いなおす——「九条—安保体制」を越えて』、NHK出版、2016年；添谷芳秀『秩序変動と日本外交：拡大と収縮の七〇年』、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16年；早期作品可见添谷芳秀『日本の「ミドルパワー」外交——戦後日本の選択と構想』。值得说明的是，添谷芳秀在中文版序言中，认为“九条安保体制”存在结构性问题，无论是宪法第九条，还是《日美安保条约》，本质上都制约日本的主题性与自立性，从而容易伤害“经济大国”日本的国际主义者的自尊心。尽管如此，虽然该体制曾经发生动摇，但通过战后整个历史过程反而又得到加强。那是因为改体制使日本的军事侵略历史意识深深扎根于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而且日本社会也感受到历史的沉重负担。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该体制应被更加准确地称为“九条安保历史体制”。参见添谷芳秀：《日本的中等国家外交——战后日本的选择和构想》，李成日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頁。

④ 本图系结合日本外交史学者井上寿一及添谷芳秀观点所绘。主要参见：井上寿一『日本外交史講義 新版』、岩波書店、2014年、第117頁。

（一）“吉田主义”——战后日本外交的基本路线

“吉田路线”，是指时任日本首相吉田茂所选择的、被此后继承者长期继承与发展的、以宪法第9条和日美安保关系为两大基轴的战后日本外交的基本路线。高坂正尧最早系统论述了“吉田路线”，而学术界提出“吉田主义”则是在吉田离世之后。

关于战后日本的国家形象和外交路线有多种提法。五百旗头真表示，主导战后日本的主要基本路线有社会民主主义路线、经济中心主义路线以及传统的国家主义路线。社会民主主义路线以“和平”和“民主主义”作为战后日本的国家目标。与之相对，以鸠山一郎和岸信介等为代表的传统国家主义路线则更加看重“独立”和“国力”的价值，主张“修宪重整军备”。而吉田茂开创的“经济中心”路线，则是一条“中庸”路线。与这种观点类似，添谷也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够取得史上罕见的复兴神话，其根源在于以“和平宪法”为前提，以日美安保关系为基轴的战后日本外交路线，而吉田茂就是这一路线的奠基者。吉田茂的选择基于对国际政治格局的洞察，立足于对战败国日本核心国家利益的判断。

1951年1月，日本外务省奉命启动了一项名为“战时外交反省”的绝密课题。据已解密的外交档案^①显示，时任首相吉田茂指示由外务省政务局政务课长斋藤镇男牵头的工作组“调研失败原因”、“以供后世参考”。

吉田茂所关注的焦点，是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至1945年二战结束期间日本外交的失误及其原因。他认为，日本外交的基调，应以维护本国利益为本，但该利益必须符合世界的共同利益。倘若日本采取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背道而驰的政策，那最终也将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经过集中调研，工作组在提交的一系列书面报告中详细总结了日本外交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及应当吸取的教训。在考察战前外交决策过程的基础上，报告全面归纳了战前对华、对美欧、对俄、对德意以及东南亚外交中的失策，明确指出这一阶段日本外交的最大特色当属“理念的缺失”。在错误的国策指导下，日本外交深受“二元外交”的困扰，促使日本加速滑向了进攻中国大陆以及与超级强国美国为敌的深渊，最终招致了日本的覆亡。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军部独大的局面，日本外务省尽管对此不满，甚至还有一定程度的

^① 2003年4月，外务省公布了这批约10万字的档案。后经原驻法大使小仓和夫整理后，于2010年公开出版。参见：小倉和夫『吉田茂の自問——敗戦、そして報告書「日本外交の過誤」』、藤原書店、2010年。

抵制，但并未采取足够有力的措施去遏制其“独走”；除政军关系失衡之外，报告中还强调了对作为“海洋国家”的日本却固执地选择对外扩张甚至与海洋强国美国为敌的不满。文件的结论部分指出，“一切都要以根为本”，“若在根本问题上存在错误，末节的苦心只不过是自慰而已”。日本自以为是的“大东亚共荣圈”理念，难被国际社会所容。鲁莽地发动没有把握和胜算的战争，结果遭到惨败。

外务省开展此项作业，正值《旧金山对日和约》酝酿期间。当时，冷战的大幕已经拉开。美国政府一方面要求日本对美“一边倒”，另一方面明确要求日本重新武装。面对内外环境的压力，作为首相的吉田茂以及外务省官僚们明面上有针对性地批判战前的“失误”，实则有为即将布局的战略思路“启蒙”与“正名”的意图。因此，可谓比较“高明”、主动的战略算计。

1951年9月8日，在与美、英、法等国签订了片面媾和的《旧金山对日和约》五小时后，日美两国又在旧金山军人俱乐部共同签署了《日美安全条约》。栗山尚一认为，战败后，日本开始战争处理工作。除确保国计民生之外，主要的任务是如何协调与占领国美国的关系。但严格意义上的战后日本外交，始于这两大条约的缔结。而吉田茂，则是当时日本外交政策的最高责任者。^①因为这两大条约均在美国旧金山签署，因此在外交学界就有了“旧金山体制”的提法。作为美国战后政策的重要一环，“旧金山体制”成为其亚太安全体制的核心。《日美安全条约》也被证实是美国战后签署的最不平等的双边协议。虽然作为在联合国能够有效保证日本安全之前的临时措施，由美国来保障日本的安全，但是，通过这一不平等条约，美国“合法地”获得了在别国领土驻军及出兵与外国作战的权利，也为美国“全方位”干涉日本内政外交埋下了伏笔。两大条约的缔结，成为日本结束占领状态、得以恢复主权的重要前提。

1952年4月28日，也就是《旧金山对日和约》生效之日，日本正式恢复主权，开始重返国际社会。第二天是天皇51岁的生日，裕仁以无比欣喜的心情，在诗中写道：东风已吹过，八重樱盛开，春天来了。^②

主权恢复后，以吉田茂为首的日本政界精英基于对新的国际国内环境特别是国家特性的认知，做出了一项基本判断：在日本国民衣食住行都无法

^① 栗山尚一「戦後日本外交——軌跡と課題」、第2頁。

^② 「天皇陛下の昭和史 87年版」、双葉社、1987年、第131頁。

充分保证的情况下，大规模重整军备会给经济带来重负，也有悖于日本的国家利益。因此，战后日本只能优先发展经济，主要用经济手段在海外伸张日本的威信。吉田茂确信，这是日本在当时条件下获得新生的最佳选择。“优先发展经济、轻军备、在安全上依附美国”的基本路线，后来被称为“吉田主义”。这一涉及国家前途的重大决策，为日本描绘出了战后再度崛起的蓝图。吉田退任后，其基本战略设计得到有效继承，使日本实现了迈向国家繁荣的历史性任务。

然而，近年来，日本学界对“吉田主义”的评价出现分歧。在积极评价派看来，尽管战后日本外交缺少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理念、构想以及为此而奋斗的勇气，但总体而言，吉田茂及其继承者们在特定的国际环境下没有迷失基本的国民要求，通过长期努力逐渐积累成果，日本实现了以经济为中心的和平发展，巩固了国内的民主主义，建立了在全世界收入差距最小、公平富裕的“成熟型社会”，并支援了以亚洲近邻各国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这种文官统治的成果，只有在战后世界的自由贸易秩序和市场经济中才有可能实现，也是在“和平宪法”框架下为避免成为军事争端的当事者而借助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庇护、获得切实的安全保障后得以实现的。这些基本上均为吉田的外交选择带来的成果。正因为吉田主义非常正确，所以直至冷战结束后依然富有生命力。与积极评价派观点迥异，消极评价派则认为，并非因为吉田的伟大，而只是“时势造人”。另外，在日本安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仍固守经济中心主义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并不存在恒定的政策，不加思考地将吉田主义规范化甚至是“神圣化”，将要遭到历史的惩罚。^①

（二）日本外交的理念与现实

可见，日本外交学界的主流看法是，日本此后的复兴与繁荣，并非仅依靠本国政治家及国民的努力而实现的，同时也与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密不可分。作为冷战体制的主要“受益者”，日本以日美关系为外交基轴，主要由美国保护其安全，特别是核安全。日本遂得以专注于经济发展，外交的主要任务也是服务经济发展。但从战后日本外交的整体实践来看，源于冷战的“旧金山体制”既给日本带来实利，也带来了明显的束缚。^② 这一深层的矛

^① 五百旗頭真「吉田路線の盛衰」、『国際問題』、2015年1・2月合併号、第3頁。

^② 栗山尚一「戦後日本外交——軌跡と課題」、第10頁。

盾，在日本政府曾大力倡导的“外交三原则”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1956年，日本外务省正式提出“外交活动的三原则”，并将其作为日本外交的“基调”。所谓“外交三原则”，由“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自由主义诸国协调”以及“坚持亚洲一员的立场”这三大目标组成。在“外交三原则”之下，外务省又确立了日本外交的三大课题，即“与亚洲诸国的善邻友好”、“经济外交”及“调整对美关系”。外务省1957年出版的《外交蓝皮书》强调，为实现外交的目标、原则与重要课题，外交与内政当表里一体，在国内政治正确认识世界大势的同时，外交也必须为国内政治提供有力的支撑。

基于对战前外交的反省，日本试图通过提出“外交三原则”来确立战后外交的坐标。但在“外交三原则”的理念与现实之间，存在难以跨越的鸿沟。正如栗山尚一所指出的那样，尽管有其积极意义，但三原则之间本身就存在矛盾。同时，在执行中与现实也有很大的乖离。以联合国为中心及与自由主义国家相协调，最起码在理念上明确了日本外交开展国际协调的方向。但是，作为“外交三原则”第三支柱的“亚洲一员的立场”，其概念本身就十分暧昧，根本问题则是坐标缺失。

“外交三原则”此后也并未能全面指导日本外交实践。在内外合力之下，日本外交逐渐沦为“外交一原则”，即彻底的亲美路线。对此，吉田茂称，“日本外交的根本方针必须放在对美亲善这个大原则上，今后也不会改变。因为这不单是战争结束后的暂时的惰性，而是遵循明治以来的日本外交的正确路线。”^① 浅井基文认为，这一路线由四项要素构成：第一，基于《日美安保条约》，在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保护；第二，同样基于《日美安保条约》，积极支持、支援美国的世界战略；第三，在国际关系中，全面支持美国的政策。为使之顺利实施，日本担当辅助的角色；第四，为确保作为西方盟主的美国的国际领导力，日本强化防卫分担、对美尖端技术合作、对外援助、对美贸易与投资、开放国内市场以及在其他方面的对美协调。^②

在彻底的亲美路线之下，日本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外交自主性。左右日本外交最大的原动力，是针对来自美国的“外压”所产生的自主路线与追随

^① 吉田茂：《十年回忆》（第一卷），韩润棠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第10页。

^② 浅井基文『日本外交——反省と転換』、第8—13页。

路线的相克。从“自主”与“对美追随”的视角，可将战后日本首相分为三类：^①第一，为了改变现状积极对美做工作的“自主派”，如重光葵、石桥湛山、卢田均、岸信介、鸠山一郎、佐藤荣作、田中角荣、福田纠夫、宫泽喜一、细川护熙、鸠山由纪夫；第二，通过获得美国的信任来达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对美追随派”，如吉田茂、池田勇人、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小泉纯一郎、海部俊树、小渊惠三、森喜朗、安倍晋三、麻生太郎、菅直人、野田佳彦；第三，在特定问题上抗衡美国压力的“局部抵抗派”，如铃木善幸、竹下登、桥本龙太郎、福田康夫。值得思考的是，长期执政的吉田茂、池田勇人、中曾根康弘、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都属于“对美追随派”。从年代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后，除了细川护熙和鸠山由纪夫两位从自民党手中夺取政权的首相外，几乎没有积极对美主张权利的“自主派”。况且，这两人执政历程都只有短短的九个月，是典型的“短命政权”。

（三）“吉田主义”外交路线的论争与转型

作为“吉田主义”外交路线，自诞生伊始就遭到来自左与右的攻击，但总体而言其基本战略设计仍得到有效继承。如在冷战期间修改《日美安全条约》时，时任首相岸信介的决策动机，是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通过谋求日美关系的“对等化”来加强日本的主体性。但修改后的条约，却在很大程度上更加明确了日本在安全防卫问题上对美依存的制度化。^②即使是提出做政治大国的首相中曾根康弘，在大的框架上也基本与“吉田主义”路线一脉相承。同时，他还积极评价这一外交路线，认为其引导日本走上战后的正途。但是，中曾根也试图去部分修正“吉田主义”。对他来说，如果不实现日美关系的对等化，就很难解决战后日本外交的“扭曲结构”，而日美关系对等的前提是实现自主防卫。冷战后，日本决策层逐步将外交战略目标调适为确保国家利益，通往“正常国家”。自此，“吉田主义”开始面临全方位的挑战。

应该看到，冷战结束后日本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的确在发生巨变，日本政治家与国民的意识也随之有了大的改变。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日本政府尽管拿出130亿美元、约占美军总支出的30%，但还是受到“太少、太迟”的批评，被说成是“支票外交”。从某种意义上说，冷战后日本外交是

^① 根据原外务省情报局局长、现任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崎享作品整理。主要参见孙崎享：《日美同盟真相》，郭一娜译，新华出版社，2014年，第265—266页。

^② 添谷芳秀：《日本的中等国家外交——战后日本的选择和构想》，中文版序，第1页。

从海湾战争的冲击中启航的。外务省对于政府未能迅速应对海湾战争所做的解释是：战后日本缺少处理类似问题的经验、政府做出决策需要时间以及政府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国内各种因素的制约。1991年版《外交蓝皮书》称，“为有效应对海湾危机等紧急事态，必须扩充外交实施体制。”^①对此，日本学界普遍认为，促使日本寻求“大国外交”的动力，固然有80年代后期经济实力增强的因素，但海湾战争对日本外交调整取向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日本对多国部队支援了巨资，却未能得到肯定评价，反而被批“只出钱，不出人”。在那场战争中，日本未能参与多国间决策，在外交上十分被动。另外，日本外交固有的决策迟缓、缺乏理念的弊端也暴露无遗。海湾战争的强烈“冲击”，使日本意识到必须寻求开展更为积极、主动、独立的外交。

在日美同盟下谋求经济中心的“吉田主义”，在冷战期间始终作为日本的基本方针，在冷战后也基本被沿袭下来。海湾战争后，“吉田主义”开始分化，既有主张继续以和平的国际协调的经济国家为中心的立场，也有主张重视日美同盟，力图修宪和行使集体自卫权，以便能和美国共同维持秩序的立场。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小泽一郎的“正常国家”论及船桥洋一的“民生大国”论。特别是“正常国家”论，给此后的日本外交带来了较大影响。小泽在其畅销书《日本改造计划》一书中承认，作为冷战期间的战略，吉田首相选择优先复兴经济的战略考虑是合理的，但问题是在克服战后经济混乱和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之后，仍然实行着眼于经济优先的政治，这使日本与“正常国家”渐行渐远，成为不折不扣的“单肺国家”。因此，小泽主张“吉田主义”这一战后路线并非是不可修改的永恒真理^②，日美应以与美国的海洋同盟为中心，同时扩大在国际领域的作用。

进入21世纪，吉田的经济中心主义开始受到强烈质疑乃至严厉批判。冈崎久彦对高坂正尧所持吉田茂领导战后日本走“通商国家”的评价予以斥责，认为当时并没有与吉田抗衡的人物，占领期吉田的业绩都是在迎合麦克阿瑟。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不存在永远不变的政策，“吉田主义”已经过时。日本智库“国际论坛”也认为，战败后将国家安全托付他国，而自己专注经济复兴的“吉田主义”是国家战略，但这样的战略在21世纪相互依存

^① 外務省『外交青書——わが外交の近況』、1991年、日本外務省、<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91/h03-contents-1.htm>。

^② 参见：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画』、講談社、1993年、第109—110頁。

的国际社会再也行不通了。^①

尽管遭到质疑与不断的政策修正，但在操作层面，“吉田主义”依然富有生命力并凭借其内在的强韧性，即使在冷战后也未遇到“颠覆性”的挑战。然而，这一局面在第二次安倍执政时期有了根本性的改变。^②对此，有学者认为，吉田茂打造了通往廉价安全的实用主义道路。但是，这一道路并非免费。它使得日本失去了自主性，日美似乎越来越不能承受这样的代价。最近一些年，曾使日美关系如胶似漆的吉田主义不断遭受质疑——这种质疑既来自支持日美同盟阵营，也来自反对同盟阵营。第四种共识正慢慢浮出水面，尽管这种共识中已经清楚地显现出不断争斗的政治和学术因素。它不再装作对现实主义者的“自助”观念视而不见，同时会利用联盟增强自己的自主性。实际上，日本已经放弃了早先关于做出“国际贡献”的试探性辩解，转而主张为了“国家利益”而奋斗。^③

安倍标榜“新保守主义国家观”，推崇“强国论”，主张清算“吉田主义”路线，力图修改宪法以“挣脱战败”，使日本成为真正自信的国家，实现防卫自强和外交自主。^④目前正在经历的这场深刻的战略转型，集中表现为以安倍为代表的新生代保守政治家们正着力修正以“吉田主义”为代表的战后发展路线，加速推进与落实“安倍主义”。这一新的战略路线，核心目标是谋求摆脱“战后体制”，最终实现日本的“全面正常化”。而外交重构的方向，是旨在为这一国家总目标服务，在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开展战略性外交。

2013年12月，日本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了战后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对新时期日本的国家利益进行了明确而系统的阐述：（1）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保卫领土、领海、领空，确保国民生命财产安全；（2）继承丰富的文化传统，维护以自由、民主为基础的和平环境，确保国家生存与发展；（3）通过发展经济，实现国家繁荣、国民富裕，进一步巩固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日本作为海洋国家，应强化基于自由贸易、公平竞争的亚太经济秩序，积极构建高度稳定、透明的国际环境；（4）维护基于自由、民主、人权和法

① 公益財団法人日本国際フォーラム「積極的平和主義と日本の針路」、2014年8月、第5頁。

② 白石隆「海洋アジアvs. 大陸アジア：日本の国家戦略を考える」、ミネルヴァ書房、2016年、第255頁。

③ 理查德·塞缪尔斯：《日本大战略与东亚的未来》，刘铁娃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7頁。

④ 参见：安倍晋三『新しい国へ（美しい国へ 完全版）』、文藝春秋、2013年。

治等普世价值及相关规则的国际秩序，增进日本的国家利益。^① 安倍核心外交团队成员、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副局长兼原信克认为，在这些选项中，兵（安全）、食（繁荣）、信（伦理及价值观）是最核心的国家利益。^② 为实现上述国家利益，以安倍为代表的日本决策层及其智囊们进行了周密的战略谋划与拆分，力图建立涵盖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及文化等方面内容的“安倍路线”。这一战略性路线，既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了“吉田路线”，又注意与之相区隔。与此同时，为综合、有效运用政策手段来实现外交战略目标，日本政府正致力于打造由首相官邸、外交行政部门、各政党、议员、经济界以及民间等共同参与的“全日本”（all Japan）体制，以期夯实外交基础，提升外交能力。

四、日本外交体制及其转型

外交机构的设立、存废与职能，往往反映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和政策目标。在日本外交研究中，外交体制变迁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研究这一问题，应就三点进行考察：一是不同时期需要什么样的外交体制，二是要探明体制的内在结构，三要探讨组织形态对决策的影响。^③

（一）外务省体制的演变

战败初期，日本一度丧失了严格意义上的“外交权”。在这一背景下，日本外务省的机构、职能与权限被大幅削减，其任务主要是处理与占领管理相关的事务性工作。^④ 战后，随着日本外交的逐步开展，主管外交事务的外务省也不断调整内部设置，以适应外交发展的需要。

与同样参与外交的其他省厅相比，外务省有信息收集、分析、拟定政策和实施的优势。外务省由外相、事务次官和外务审议官分工负责，下辖地区局和功能局处理日益复杂的外交事务。外务省内的主要行为体有：（1）外相。外相大多由首相在“党内的实力人物”和“首相亲信”中选任，这已渐

^① 「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いて」、2013年12月17日、日本内閣官房、<http://www.cas.go.jp/jp/siryou/131217anzenhoshou.html>。

^② 兼原信克『戦略外交原論』、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11年、第60—61頁。

^③ 借鉴了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川岛真的研究思路。参见川岛真：《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田建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4—75页。

^④ 参见：外务省『百年史編纂委員会編 外務省の百年（下）』、原書房、1979年、第761頁。

成惯例。吉田茂曾主张不启用外行担任外相，其理由是来自外务省的经过多年国际事务训练的人最为恰当。战前外务省通常是“官而优则相”。战后一段时期内，外相一职亦多为外交官出身者所垄断，如东乡茂德、重光葵、吉田茂、芦田均等都是外务省出身的政治家。这些人之所以能当上外相，最主要的原因是盟军总司令部为了便于同日本政府沟通，希望有“会说英语的大臣和首相”。事实也正是如此，在盟军占领期间，外交官出身的外相能以语言为武器，获得比一般政治家更高的权威。但原外务事务次官法眼晋作持不同看法，主张外相要具备三方面的素质：对国内政治也要有相当的影响力。外交和内政是表里一体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意味着外交要为内政让路，也不意味着外交是内政的附属品，而是意味着找到外交与内政的最佳妥协点。因此，外相必须是日本政治中的实力人物，不能屈服于内政上的压力，凛然说明自身的想法，有必要得到首相的支持。再者，外相不能为一己之私和提高人气而行动。除此之外，外相必须养成快速阅读文件的能力。^①在省厅的外交决策过程中，外相在听取省内政策建议的基础上，可根据形势的变化或参照国内其他领域的政策，对局、课上报的重要政策建议做出预判并向首相汇报。作为外务省的最高负责人，外相在日本外交决策程序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2) 事务次官。外务事务次官是辅佐外相的事务当局最高负责人。通常由精熟外务、外国语以及经验丰富的省内各大局局长、一流驻外使节或外务审议官担任。在省内决策程序中，事务次官兼有上传下达、临机决断、草拟政策的职权，是基础性操作过程的核心人物。其主要职责是审阅各驻外使馆发来的电文，掌握、分析各类情报。在此基础上，召集外务审议官、相关局、课长集中讨论，研究对策，做出指示。外交政策通常先由各局的副课长草拟，再交予主管局长。其中涉及各局的问题，就由外务审议官居中调整。政策草案形成后，再送交事务次官审定。如是涉及其他各省的问题，由外务审议官来统一调整。外交方针大致确定以后，即由事务次官向外相报告。这就是外务省内最常见的政策流程。

(3) 外务审议官。1960年，外务省增设了“外务审议官”这个仅次于外务事务次官的职位。设立该职，是鉴于日本对外活动频繁，事务次官要处理的案件急剧增多，仅靠其一人难以充分应对，所以外务省提出希望设立像美国助理国务卿那样的职位，这一要求得到行政管理厅批准并对《外务省设置法》作了修正。以往外务省在决策时，其

^① 法眼晋作『日本外交戦略』、原書房、1981年、第49頁。

缺陷之一就是时常以主管局、课为中心草拟政策，同其他局、课之间的政策调整并不充分。因此，外务审议官一职设立后，曾一度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4) 局。《旧金山对日和约》生效后，外务省得以恢复作为中央外交机构的职能，正式开始处理对外关系。鉴于“经济外交”成为日本外交的重点领域，1959年4月1日，经济局内新设经济合作部，其职能是：拟定经济外交政策方案；与各国协商经济合作协定；保护海外投资利益；技术交流、合作及调查等。为强有力地推进“经济外交”，当时还有过将经济合作部打造为经济合作厅的设想。1962年，经济合作部升格为经济合作局。除经济局之外，条约局和北美局也因其工作对象的特点，逐渐成为外务省中最有影响力的机关。随着日本国际地位上升，对外联系日益紧密，为更有效地实施对外政策，外务省开始对各职能局与地域局予以大规模改组。1985年临时行政调查会的最终报告指出，有必要强化外交政策的综合调整机能。战前的日本在面临重要局面时，往往在地区局和功能局上设立政务局，探索新的综合政策。冷战结束后迎来了危机频发的局面，1993年8月设立地位居于其他局之上的综合外交政策局，负责协调各职能局与地域局与政策拟定相关的工作。综合外交政策局有三项职能：对综合的外交政策进行跨部门的企划和拟定方案、危机管理以及综合处理联合国事务。^①应当说，自成立以来，综合外交政策局发挥主要影响力的场合是危机管理，在其他方面并未见到明显成效。在2001年省厅行政改革中，外务省设两名副大臣和三名大臣政务官。亚洲局更名为亚洲大洋洲局，欧亚局更名为欧洲局、中近东非洲局更名为中东非洲局。

(5) 课。在外务省机构中，课的作用非常关键。由于其处于实际拟定政策的位置，往往在关键问题上具有重要影响力。遇到首相关注的问题，课长级的官员同样能频繁进出首相官邸。一般而言，课内起草政策的多为年龄在30岁至35岁之间的副课长。

(6) 驻外机构。外务省突出的特点是拥有大量的驻外机构。因此，同使领馆的沟通和交流，在省内政治过程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与媒体的驻外机构和综合商社相比，外务省驻外机构拥有较为庞大的信息网络。驻外机构每天向外务省提供大量来自一线的新鲜的决策信息，供省内相关部门及人员参考。

以上各部门的重要人事安排，也体现了“吉田主义”外交路线的特点。

^① 五百旗頭真など編『外交激変——元外務省事務次官柳井俊二』、朝日新聞社、2007年、第122—123頁。

由于战后日本外交中根深蒂固的对美追随政策，因此从政策角度来看是亲美安保派、从官员所学外语角度来看是英语派占据了中枢位置。外务省内反主流派则试图通过打开对亚洲国家外交来摸索与主流派不同的路线。

外务省内的决策程序，除了在外务事务次官亲自主持下，由局、课等基层部门起草政策方案，再逐层上报批准的“禀议制”（ringi system）之外^①，还有独具特色的会议制：（1）省议。省议大多在编制预算期间召开，参加者是外相、副大臣及大臣政务官。（2）干部会议。通常于每周二及周五召开两次。参加者为事务次官、外务审议官、各局局长、官房长官、官房审议官（总务担当）、外务参事官（国会担当）、官房总务课长，通常被称为外务省内的“御前会议”，讨论内容多为各局提交的报告及互相交换外交政策方面的意见。在形式上，官房总务课也可设定议题，但实质上议题由各局提供。（3）新闻会议。各局局长、官房各课长（总务课长、报道课长、国内宣传课长等）在事务次官办公室会合，主要是针对当天各大媒体涉及外交的重要报道互相通气。（4）紧急会议。紧急会议也经常召开，一般也在事务次官主持之下进行。如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制裁伊拉克的决议案时，事务次官视情况召集中近东第一课长和联合国政策课长协商。当对华政府开发援助问题出现时，召集亚洲大洋洲局中国课长和经济合作局的有偿资金课长、无偿资金课长等协商。另外，由综合外交政策局主持召集的此类会议也日渐增多。（5）主任课长会议。主任课长会议主要由各局排位第一的课长组成，每周召开一次。各局的第一课长指的是综合外交政策局的总务课长、亚洲大洋洲局的地区政策课长、北美局的北美第一课长、中南美局的中南美第一课长、欧洲局的西欧第一课长、中东非洲局的中东第一课长、经济局的国际经济第一课长、经济合作局的政策课长、条约局的条约课长等。（6）局议。各局每周召开一次局议，是局内共享信息的重要平台。参加者为局长、审议官、课长、副课长等成员。由局长传达干部会议的最新精神，之后由课长汇报主任课长会议的情况。

进入 21 世纪，特别是随着 2001 年贪污、失言等各种丑闻频频见诸报端后，外务省才真正驶上了改革的“快车道”。有学者曾形象地说，那时的外务省处于“破产清算”的状态。在媒体和舆论眼中，外务省成了“特权省”

^① 参见张勇：《日本战略转型中的对外决策调整——概念模式与政治过程》，《外交评论》，2014 年第 3 期，第 54 页。

与“害务省”^①。舆论压力传导到省内，极大地影响了外交官们的工作士气。

2002年2月12日，时任外相川口顺子发布十项改革措施：排除不正当压力，特别是处理好与相关议员的关系；摒弃错误的精英意识，树立为国民服务意识；重新制定人事制度；彻底保守秘密；提高ODA的效率和透明度；外务省预算的有效及透明利用；建立与非政府组织的新型关系；建立新的对内、对外宣传制度；驻外使馆职能及人员的重新调配；增加政策草拟过程的透明化，在外务省建立“对外政策审议”机制，定期对政策进行评议。为推动改革，特设由外部有识之士组成的“外务省改革之会”，围绕上述十项措施，展开更加深入、细致的讨论。^②正如《朝日新闻》社论委员船桥洋一所指出的那样，在外务省开展工作时，应确保排除主要来自执政党政治家的不当压力。如在对俄外交及对华农产品紧急限制措施问题上，由于“族议员”的施压，使日本外交缺乏应有的灵活性。他指出，改革“政官关系”是政治改革与强化日本外交体制的契机。船桥建议：制定政官关系的规则。外务省的问题是不仅仅来自政治家个人的压力，还有自民党政调委会各个部会，执政党的事前审查机制应予以废除；确立外务省对国会的说明责任，强化日本外交的支持基础；强化外相的威信和权限；强化以首相为中心的内阁主导体制。^③

值得注意的是，战后外务省曾长期面临人员和预算困境。^④日本政界、外交界曾力促改善外务省现有人员和财政状况，以适应“自主外交”的要求。如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曾根康弘就认为，“战后，日本外务省的预算、编制和驻外使领馆的数量，从经费与效果对比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外务省方面是努力奋斗了的。但是，在现阶段，同日本的国力比较，他们的工作就显得不能胜任了，这是实际情况。日本已成为现在这样的大国，而且是属于军事力量微弱型的国家。因此，为了国家的安全和发展，正要求外交做出

① 在日语中“外”与“害”发音相同。意指外务省的丑闻损害了国家利益。

② 2002年3月6日，“外务省改革之会”举行首次会议，其成员为宫内义彦（主席），阿川尚之、生田正治、今川幸雄、冈本行夫、神田秀树、嶋津昭、田中明彦、藤原美喜子、船桥洋一、星野昌子、吉永道子、渡部悖。外务省由外相川口顺子、植竹繁雄、杉浦正健外务副大臣、今村雅弘、松浪健四郎、水野贤一外务大臣政务官、竹内行夫事务次官等出席，共召开12次会议。

③ 相关内容参见：船桥洋一「政と官——何が問われているのか。何をすべきか。」、2002年3月19日、日本外務省、http://www.mofa.go.jp/mofaj/annai/honsho/kai_genjo/change/funabashi_p.html；外務省改革に関する「「変える会」第2回会合（議事録要旨）」、2002年3月19日、日本外務省、http://www.mofa.go.jp/mofaj/annai/honsho/kai_genjo/change/change_2g.html。

④ 渡辺昭夫など編『講座国際政治④日本の外交』、東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第63—64頁。

更大的努力，然而作为其核心的外务省目前的状态，是令人寒心的”。^① 构成一国外交力的主要因素是人。根据 2013 年度调查结果，日本外务省职员数为 5876 人，美国为 28505 人，为日本的四倍。俄罗斯为 11708 人、法国为 9334 人、中国为 9000 人，德国为 8046 人、英国为 6530 人。日本外务省职员数近 10 年来基本稳定在 2006 年的 5453 人到 5876 人之间。与 2015 年的 5787 人相较，2016 年增加了 100 人。2016 年 5 月 11 日，自民党外交再生战略会议通过决议称，为配合安倍政权的“俯瞰地球的外交”，2020 年外务省职员应增至 6500 人。^②

二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和在国际舞台上活动空间的不断扩大，外交政策制定的省厅日益多元化。除外务省之外，大藏省、通产省、文部省、科学技术厅等相关省厅也在不同课题以及不同层面上介入外交决策过程。特别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原来被称为“对内省厅”的建设省、邮政省等也开始涉足外交决策课题。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如何协调各省厅的利益关系及政策立场的问题，而单靠外务省来执行这项任务显然是不够的。因此，强化首相及首相官邸的地位就日益提上了议事日程。

（二）外交中的“政治主导”

冷战结束后，主张外交应由政治主导的观点渐趋强势，随着 2001 年新行政改革的实施，政治主导外交成为主要特征之一。原东京大学校长、知名政治学者佐佐木毅认为，政治主导不是政治家主导，而是首相主导。^③ 京都大学教授待鸟聪史也认为，这是“首相在包括政治任命者的直属人员的辅助下，以内阁为主要权力基础而开展的政权运营及政策决定的手段”。^④ 从官邸主导的定义来看，其最大特征是首相依靠直属的人员。具体到官邸外交，日本国际大学教授信田智人在其《官邸外交》一书中将之视为“首相及官房长官指导内阁，在外交及安全问题上发挥领导能力的形态”。^⑤

日本政府的决策过程从“55 年体制”下的官僚主导型变为 20 世纪 90 年代的政党主导型，在 21 世纪初逐渐转向首相官邸主导型。应当说，2001 年

① 中曾根康弘：《新的保守理论》，金苏城、张和平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 年，第 112—113 页。

② 自由民主党外交再生戦略会議「国際社会を主導する外交を求める決議」、2016 年 5 月 11 日、日本自由民主党、<https://www.jimin.jp/news/policy/132249.html>。

③ 参见：佐々木毅『政治の精神』、岩波書店、2009 年、第 213—220 頁。

④ 待鳥聡史「官邸主導の成立と継続」、『レヴアィアサン』、木鐸社、2008 年、秋季号、第 25 頁。

⑤ 信田智人『官邸外交——政治リーダーシップの行方』、朝日新聞社、2004 年、第 7 頁。

中央行政机构改革施行之后，特别是小泉内阁的出现，才使得舆论界和学术界对官邸在决策中的角色给予集中关注。

在外交方面，长期以来内阁与自民党将实质性的决策权“下放”给外务省的中高层官僚，必须做出政治决断时，方由首相与外相来决策。但从突出首相领导力的桥本内阁开始，内阁机能得以强化。为应对“9·11”这一重大且需快速反应的危机事件，小泉政权活用了这一得到强化的政治制度。小泉缔造了21世纪初期日本的第一个长期政权。^①在五年零五个月的执政生涯中，他以崭新的政治手法使得一些旧有的乃至全新的词汇成为公众耳熟能详的话语，如“官邸主导”、“首相主导”、“总统型政治”、“政治主导”、“民众主义”、“脱派阀”、“由官到民”、“剧场政治”、“作秀内阁”等等。作为日本外交的最高决策者，小泉展开了极具个人色彩的外交实践。^②由其本人引发的“小泉现象”也受到日本学术界与舆论界的高度关注。在诸多研究小泉及其政权的成果中，尽管对其个性、政治理念、执政风格及执政成果褒贬不一，但较为一致的认识是“小泉纯一郎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日本政治家”。那么，是什么因素支撑小泉成为一个“强势”首相的呢？对以后的首相又有哪些启示？

尽管众说纷纭，但也可归纳为以下四种较有代表性的意见：（1）个人能力。日本政治学者大岳秀夫在《小泉纯一郎民粹主义研究》一书中更倾向于使用“个人能力”^③这一说法，即着重分析小泉特异的个性和能力。他重点关注小泉首相特立独行的性格，作为民粹主义者发挥到极致的对舆论的“人心掌控术”，对谋取更大领导能力的精准计算和果敢的实行等小泉自身的能力，以及擅于授权有能力的人来实施等偶然性因素。大岳将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民粹主义定义为“凭借大众媒体唤起和操纵舆论的政治现象”。^④另外，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蒲岛郁夫所使用的“说服政治”也可作为分析小泉时期民粹主义的理论工具。蒲岛认为，在现代政治中“说服政治”变得愈发重要。卓越的说服力有助于获得选民的支持。原先自民党的政治系统推行的是如何分配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这一“分配的政治”，小泉则明确主张与之诀别。

① 小泉纯一郎于2001年4月26日当选日本首相，2006年9月26日届满离任，在位共计1980天。其执政时间居战后历任首相第三位（前两位分别是佐藤荣作和吉田茂）。

② 小泉任首相期间，共计出访51次，电话会谈92次，在日会见各国首脑203次，会见其他各国要人576次。

③ 大岳秀夫在书中着重研究了小泉的“民粹主义”政治手段。参见：大岳秀夫『小泉純一郎ポピュリズムの研究：その戦略と手法』、東洋経済新報社、2006年。

④ 大岳秀夫『小泉純一郎ポピュリズムの研究——その戦略と手法』、第2頁。

他提出“即使是负增长也要实施结构改革”和“自民党必须放弃既得利益”等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选民的“共鸣”。^①可见，小泉时期的民粹主义不只是唤起和操纵舆论，还有对舆论的迎合与追随。这一时期的民粹主义也被称为依托大众媒体的剧场政治。这是战后日本政治中较为新颖且重要的现象。在决策过程中，小泉政府既主动唤起和操纵舆论，又被舆论所牵制。小泉的这一手法，对此后的政治家特别是安倍产生了重要的示范效应。民粹主义在日本的流行已成为当前突出的政治现象。（2）制度^②。持这种意见的学者认为，首相地位极大加强，这主要应归因于众议院选举政策、行政改革、政党助成金改革等制度性变革所引发的连锁效应。加之小泉十分注意最大限度地灵活使用得到强化的首相权力。这种观点主张，小泉时期决策系统的变化属于结构性的变革。因此，在今后较长时期，尽管不能排除平庸之辈出任首相，但他也能在这一政治舞台上发挥积极作用。（3）制度+个人能力^③。日本政治学者内山融认为，小泉首相的政治手段主要由两方面构成：一为“激情首相”，即通过强调善恶对立这一剧场化政治，获得国民的支持，突出的是小泉的个性特征；二为强有力的首相，主要基于支撑小泉发挥领导能力的制度性因素。（4）制度+个人能力+舆论支持。小泉执政时期总体上保持了较高的支持率也是其“强势”地位的源泉。曾长期担任小泉政治秘书的饭岛勋称小泉是担负着日本国民的期待上台执政的。^④据JNN调查，小泉的内阁支持率最高达到92.8%。在小泉内阁的电子杂志上，日本学者五百旗头真这样评价小泉：“战后的自民党政府，由党和官僚两大机器联动，加上作为其支持母体的庞大利益集团，实施了恣意的派阀政治。以压倒性的支持率为背景，小泉首相上演了一幕打破长期以来实行的派阀政治和既得权政治的大戏。实施了不受派阀左右的阁僚人事，战后日本史上只有吉田茂和小泉。与吉田茂执政后期的不受欢迎相比，小泉执政的5年中并未见到支持率的衰退。真是一个创造奇迹的人。”^⑤

① 蒲岛郁夫『戦後政治の軌跡——自民党システムの形成と変容』、岩波書店、2004年、第366頁。

② 基于“制度说”的成果主要有：竹中志堅『首相支配——日本政治の変貌』、中央公論新社、2006年；信田智人『冷戦後の日本外交——安全保障政策の国内政治過程』、ミネルヴァ書房、2006年；信田智人『官邸外交——政治リーダーシップの行方』、2004年。

③ 日本学者内山融在《小泉政权》一书中提到了这两个特点。参见：内山融『小泉政権』、中央公論新社、2007年、（はじめに）iii頁。

④ 飯島勲『小泉官邸秘録』、日本経済新聞社、2006年、第7頁。

⑤ 五百旗頭真『小泉政権5年をこう見る』小泉内閣メールマガジン 第248号（2006年9月7日）。

在小泉执政时期，自民党内有着这样一种默契，即尽管不满意小泉独断专行的执政手段，但“不能让一个有较高民众支持率的首相下台”。与此相应，有着这样一个小泉的人气效应也使自民党在选举中收获颇多。2001年7月29日，日本举行第19届参议院选举。这是小泉政权成立以来的首次国政选举，约5700万人参加投票，占总选民数的64%。蒲岛郁夫将这次选举称为“期待投票”型选举，各方最为关注的是，拥有高支持率的小泉内阁，究竟能否通过本次参院选举得到体现。^①结果，自民党获得64席、民主党26席、公明党13席、自由党6席、共产党5席、社民党3席、保守党1席、其他党派及无党派3席，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小泉的人气为自民党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与时任美国总统布什的个人关系，也为小泉较为自主地开展外交提供了一定的条件。2001年6月，小泉首度访美。在担任首相之前，小泉并未真正有过外交经验，开始时或许因过度兴奋而显出紧张之态。^②饭岛勋认为，此次会谈的最大成果是在小泉和布什之间建立了“个人信赖关系”。会谈后，布什称，“于我而言，小泉首相是挚友。我们定能进行良好的合作”。小泉亦称，“初次首脑会谈就能构筑起这样的信赖关系，非常令人欣慰！”^③9月25日小泉再度访美，布什将《白昼的决斗》的电影海报彩印复制品作为礼物赠送给小泉，并在上面郑重签名。曾担任驻美大使的柳井俊二从这一细节得出这样的结论：“由此可见，布什对小泉抱有好感。”^④五百旗头真认为，在“9·11”事件后充满危机的国际政治中，小泉首相通过维护日美之间未曾有过的紧密关系，在外交方面取得了政绩。对于小泉幸运的是，美国布什新政权的诞生为构筑良好的日美关系提供了条件。^⑤兼原信克也称，“在小泉和布什执政时期，日美关系进入了由小泉和布什构筑的黄金时代。”^⑥

最后，小泉的长期执政也成为其“强势”的一大原因。冷战后到第二次安倍内阁之前，海部俊树、宫泽喜一、细川护熙、羽田孜、村山富市、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森喜郎、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福田康夫、麻生太

① 蒲岛郁夫『戦後政治の軌跡：自民党システムの形成と変容』、第353頁。

② 五百旗頭真など編『外交激変——元外務省事務次官柳井俊二』、朝日新聞社、2007年、第247頁。

③ 飯島勲『小泉官邸秘録』、第16頁。

④ 五百旗頭真など編『外交激変——元外務省事務次官柳井俊二』、第251頁。

⑤ 东京大学教授田中明彦也认为：“之后的小泉外交，因布什政权的信赖而得到支持”。参见田中明彦：『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NTT出版、2007年、第270頁。

⑥ “9·11”事件时兼原时任外务省北美局日美安全保障课课长兼企划课长。参见：兼原信克『積極的平和主義への転換——9·11から海上自衛隊インド洋派遣へ』、『外交フォーラム』、2008年11号、第38頁。

郎、鸠山由纪夫、菅直人及野田佳彦等 12 位先后出任首相，并走马灯似的多次改组内阁。

小泉政权之后，首相（包括安倍的第一任期）并未足够活用已经强化了的政治制度，开展官邸主导的外交政策。自 2012 年底组阁以来，安倍在外交与安全问题上延续并发展了小泉时期的官邸主导的局面。对此，日本媒体习惯性称之为“君子豹变”^①，形容其变化之大，前后判若两人。安倍能够开展首相官邸主导下的外交，除了活用小泉执政时得以强化的首相及首相官邸的权力之外，还有以下重要原因：第一，对发挥首相领导能力有强有力的意志与能力。安倍表示，“我是经历过重大挫折的人，但作为政治家的根本姿态并未发生变化”，^② 其目标是做敢作敢为、不畏指责的“战斗型政治家”。第二次安倍内阁接连推出并通过关键性法案即为明证。加之，安倍注重发挥“小集团”决策模式，在重要问题上直接授意“侧近”去做。例如，2015 年安倍访美，以“迈向希望的同盟”为题作了长达 45 分钟的英语演讲。原先，首相的重要讲话稿一般由外务省草拟并反复征求首相本人及对象国的意见，才能最终定稿，最后体现的并不一定是首相的真实想法。而安倍的讲稿，从草稿到最终完成至少修改了 10 稿以上。首先是了解安倍首相想法和心态的内阁参事、庆应义塾大学教授谷口智彦负责撰写初稿。在此基础上，首相、谷口等人反复磋商，针对讲话的结构和顺序、表达方式、关键词的使用方式和英语译法的准确性等，从各种角度进行仔细推敲。其间还向国家安全局局长谷内正太郎、驻美大使佐佐江贤一郎和外务事务次官斋木昭隆征求了意见。由于“remorse”（反省）这个关键词会出现两次，为了表现对于众多“美国年轻人”丧身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段“无可挽回的、惨烈的”历史的反思和忏悔之意，安倍他们将其中一个改成了更具宗教意义的“repentance”（悔悟）。定稿方案直到 4 月 26 日才在飞往美国的专机上被交到首相手中，完成稿的最终出炉可谓经过了细致入微的反复推敲与琢磨。^③ 第二，国家安全委员会（日本版 NSC）的成立。经长期酝酿和推动后，日本国家安全委员会于 2013 年 12 月 4 日正式启动，日常办事机构也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宣告成立。该机构的设立具有双重含义，既是国家安全战略实际运营的组织基础，

① 出自《周易》革卦：大人虎变，小人革面，君子豹变。

② 安倍晋三「新しい国へ（美しい国へ完全版）」、第 5 頁。

③ 鈴木美勝「安倍首相が米議会演説で示した歴史認識と日本の選択」、2015 年 5 月 12 日、<http://www.nippon.com/ja/column/g00278/>。

也是外交与防务决策机制变革的重大举措。其目的在于确立首相官邸主导外交与防务问题的最高指挥部职能，提升日本战略决策与快速综合反应能力，为其“正常国家”甚至是“全面大国”的战略目标服务。根据不同的课题，灵活举行以首相为首的“四大臣会议”、“九大臣会议”以及危机发生时由首相指定人员参加的特别国务大臣会议。国家安全局全面负责“日本版NSC”事务层面的工作。该局的主要职责是对决策信息进行系统分析与处理；同时，召集相关省厅的次官和局长等级别的干部，通过召开专门会议汇总并拟定草案；此外，该局也负责与各国主管国家安全的相关机构“对接”，进行日常性的沟通与合作。在具体的人员配置上，该局由来自各省厅推荐的67名成员构成，下设综合、战略、情报、盟国·友国、中国·朝鲜以及其他区域等6个部门，其中3个部门的一把手来自防卫省，2个来自外务省，1个来自警察厅。第三，内阁官房长官对外务省调控能力增强。^① 内阁官房长官一职，原本不是内阁阁僚，只是统管内阁庶务。战后较长一段时间，通常由分量较轻的政治家担任该职，但如同佐藤荣作内阁起用党内元老级政治家保利茂那样，后来一些内阁多起用重要阁僚担任此职。中曾根康弘内阁的后藤田正晴便是典型代表。另外，2001年实施新的省厅改革后，内阁官房大幅增加编制，人数约为1995年的两倍。新《内阁法》第12条明确了内阁官房对内阁重要政策的“企划、拟定方案及综合调整”之权限。内阁官房为最高和最终的调整机关，在政策调整上位居各省之上。在首相领导下，内阁官房主导政策。这样一来，从整体上统揽这项工作的内阁官房长官的作用就得到了实质性提升。然而，与自民党长期执政的时代不同，现在的安倍内阁，是自民党经过2009—2012年在野时期后重新执政并与公明党建立的联合内阁。那么，内阁就不能继承同一执政党内的前内阁，而必须否定反对党组建的前内阁，建立起脱胎换骨的新政权。因此，内阁官房长官的作用就不再仅限于作为重要阁僚受到首相信任，并对跨部门决策负有最终责任这样维持现状式的作用了。他必须承担起在否定前内阁、同时又继承过去遗产的作用。积极干预人事是菅义伟的特点。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他无视过去由副职接任内阁法制局长官的惯例，起用了时任驻法大使的小松一郎，为修改关于集体自卫权的宪法解释铺垫了道路。此外，在美国政府对安倍首相2013年12月参拜靖国神社发出“表示失望”的声明之际，首相辅佐官卫藤晟一发表了“倒不如说是我们对美国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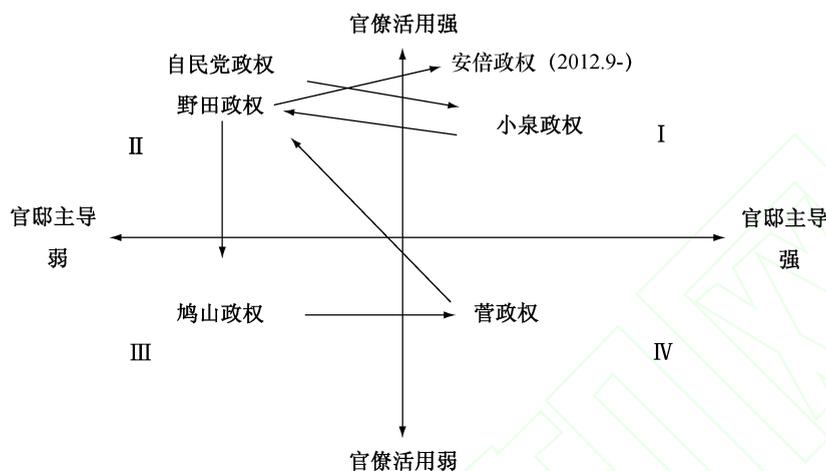
^① 牧原出「菅義偉の調整力——第2次安倍政権・内閣官房長官の役割」、2014年8月21日、<http://www.nippon.com/ja/currents/d00135/>。

到失望”的评论，当时菅严厉地斥责了卫藤。这种路线修正的做法也反映了其危机管理能力的高超之处。如上所述，菅通过“人事”和“斥责”控制了官僚、各省和相关部门。纵观党和官僚机构，现任内阁内能够进行这种调控的人物或组织几乎再无他者。因此，如今关键信息都会集中由其来加以处理。

从“吉田主义”时期到安倍执政时期，官邸主导能力及对外务省官僚的活用能力不尽相同。通过观察图-2，可较为直观地对其进行“定位”。横轴代表官邸主导的强弱，纵轴代表官僚活用的强弱。在传统自民党时代，外务省官僚在外交实践及政策制定中发挥了实质性的作用，因而是典型的“官僚主导”的特点。首相除了在类似旧金山媾和、冲绳返还以及中日邦交正常化等重大外交决策上发挥首相个人的领导能力的特例外，通常较为注意处理与外务省官僚的关系，但官邸主导意图与能力均相对较弱，因此归于第二象限；呼吁“政权更迭”的民主党在2009年众议院选举中取得大胜，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出任首相。在政府内首相官邸与相关省厅的关系上，他力主“政治主导”、“首相主导”和“官邸主导”。但事实上，在诸如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上，只是有意识地将外务省与防卫省官僚排斥在外，却未用强有力的官邸主导措施来跟进，结果导致内阁官僚也各自为政，最后又不得不回到自民党时期的做法（第三象限）。菅政权时，在“钓鱼岛抓扣事件”上实行以仙谷由人官房长官为中心的表面上的官邸主导，但并未活用官僚的知识，结果决策失误。该事件充分暴露了首相官邸在解决问题时手法的稚嫩、卤莽和笨拙，菅直人内阁领导能力和民主党的执政能力备受质疑，同时又给中日关系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第四象限）。继任的野田政权执行了“不是自民党的自民党政策”，较之官邸主导，更强调活用官僚（第二象限）。在小泉政权和第二次安倍政权执政时期，官邸主导与官僚活用的能力均较强。在实施外交中的政治主导时，并非排除而是有效地与官僚合作（第一象限）。

近年来官邸主导重大外交政策成为日本外交中较为常见的现象。客观而言，加强政治主导，强化领导人权力与权威，在国际上并非日本一家。有学者认为，宪政意味着对官僚理性的合理的系统性的运用，这一理念在伊藤博文那里非常明显，并且成为美浓部达吉的思想核心。^① 依据日本议会内阁制之精神，内阁行使行政权，对国会负连带责任。加强内阁特别是首相的领导权，对于外交充分反映民意是有积极意义的。此外，在外交问题日益复杂化、

^① 特索·纳吉塔：《当代日本政治的思想基础》，何雷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28页。

图-2 官邸主导与官僚活用^①

参与行为主体随之多元化的全球大变革时代，需要足够的战略统筹和综合应对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主导外交有其必然性与可行性。但与此同时，政治主导外交也有较为明显的缺陷甚至是危险性。在缺乏足够的决策信息时，官邸主导较难避免决策失误；或者是介入本应属于外交官僚职权范围内的业务，也容易造成外交体制上的混乱。^②特别是当缺少足够的制衡时，难免出现首相集权的局面。这一态势业已显露。安倍相权“一极独强”，短期内无论是政府还是执政党内均难以出现有力的挑战者。当重大外交事件发生时，倘若依凭较高的支持率来操纵民意，可能会走向其强调的“民主”的反面。在这点上，原外务省外务审议官、现日本综研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田中均认为极易造成首相“暴走”的局面，因此不应期待“首相独强”。他建议，与其期待强有力的首相，不如重构有效实现外交课题的政官关系，官僚从专业角度向政治家提供具体的提案，政治家基于这些提案对大局作出判断和决策。这才是应有的政治过程。^③此外，日本国内也有观点认为，外务省官僚的个人能力较强，因此不应仅实施外交政策与对外谈判，而应在冷静思考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向决策者提出理性的、便于操作的方案。同时，在政

^① 原图系日本学者信田智人所绘，本文有所修正。信田智人「外交における政治主導」、井上寿一など全編集委員編『日本の外交 第6巻 日本外交の再構築』、岩波書店、2013年；信田智人「政治主導 vs. 官僚支配——自民政権、民主政権、政官20年闘争の内幕」、朝日新聞出版、2013年、第215頁。

^② 柳淳「外交入門——国際社会の作法と思考」、時事通信社、2014年、第96頁。

^③ 明石康編「連続シンポジウム 日本の立ち位置を考える」、岩波書店、2013年、第176頁。

权更迭时应着力维持基本外交政策的稳定，避免走极端。这应当是新时期外交官的责任。

五、日本外交：超越“死之跳跃”？

在又一个历史关键时刻，日本正着手重新确立它在国际秩序中更广泛的作用。此举势必在亚洲内外产生深远的影响。^①

《超越“死之跳跃”》，是已故佐藤诚三郎教授的名著，生动地描写了明治维新时期日本通过自我革新，以直面来自西洋的冲击。在新版序言中，北冈伸一写道：幕末维新是近代日本最重要的转折点。而现在的日本，已先后经历了“失去的十年”和“失去的二十年”，当吸取先人的历史经验与传统智慧，找到打破闭塞状况的启示与教益。^②

近代以来，日本在应对危机时经历了三次重大转型，即1868年前后的明治维新、1945—1952年的美军占领时期，以及1990年之后到21世纪初的后冷战时期。日本经历了开国、崛起、争霸、侵略、战败、复兴与停滞，正在寻找新的方向。

二战战败后，作为现实主义者的吉田茂，选择了一条较为“中庸”的国家发展路线。但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日本一定会重新站立起来，成为承担应有责任的主权国家”。可见，将本国防卫权让于美军，只埋首于“经济发展”，对外“低姿态”，并非吉田的本意，他也多次说过反对“吉田路线”这一提法。在安全防卫问题上，吉田不反对适度重整军队，甚至还提出过“拥核”言论。他反省战败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主要是对不应与“海洋国家”美国开战的懊悔与无奈，欠缺对侵略亚洲的诚挚反省。作为政治家个人，其身上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与局限性。但正如尼克松所言，他留给日本人的最大遗产，还是其明智的外交政策。^③

历史的接力棒已交到安倍手中，能否继承并发展先人的智慧，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在“宪法九条”、“日美同盟”、“经济中心”及“历史遗产”这四

^① 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244页。

^② 北冈伸一：「新版の刊行にあたって」、佐藤誠三郎：「死の跳躍」を越えて 西洋の衝撃と日本」、千倉書房、2009年。

^③ 尼克松：《领袖们》，刘湖等译，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160页。

大战后日本外交课题面前，今后又当何去何从？无疑，这将由历史来明断。

在第三次转型面前，日本正在积极布局“安倍路线”，加速向“正常国家”这一目标迈进。目前正在进行中的“安倍路线”，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新时期日本战略尝试。这一涵盖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社会乃至国民意识的系统性政策“实验”，与倡导对外“低姿态”的“吉田主义”相较，具有明显的进取性和较大的不确定性。尽管“安倍路线”的持久性仍待检验，但其对内对外带来的影响乃至冲击无疑是巨大的。“安倍路线”的战略目标，是维护与拓展国家利益，而动员本国及盟国所能使用的各种力量则是实现目标的手段。

安倍提出“积极的和平主义”，致力于开展战略性外交。考察日本政府近年来公布的安全文件，“不确定性”、“威胁”及“挑战”等字眼随处可见。日本政策界有这样一个逻辑，为了应对内外战略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必须加快国家外交与安全战略的转型。在日本《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强调日本政府应基于国际协调主义的“积极和平主义”立场，努力实施“俯瞰地球的外交”。^①在安全问题上，日本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接连出台“安保三箭”，制定了《特定秘密保护法》。此外，还调整了武器出口三原则，宣布解禁集体自卫权，致力于重构安保体制。在安全问题上，安倍的考虑是：“现在已不是任何国家仅依靠一国之力就能守卫和平的时代了。为保卫国家应允许部分行使集体自卫权，使“无缝应对”成为可能，并提高威慑力。”^②作为安倍内阁最重要课题力推的安保法案，经过与在野党的激烈交锋，于2015年9月19日凌晨经参议院大会审议表决获得通过。战后70年，行使集体自卫权被定为法律，这使得日本的安全政策迎来重大转折。

在这方面，日本智库也积极为安倍献策。2008年9月，日本智库“国际论坛”曾召集逾80多名政治家及学者，围绕“积极的和平主义”进行专题讨论，翌年10月向政府提交了以《积极和平主义与日美同盟的应有状态》为题的战略报告。在安倍二度执政后不久，2013年11月，该智库召集72名各界精英再次专题讨论“积极的和平主义”，于2014年8月向政府递交了题为《积极和平主义与日本进路》的报告，建议解禁集体自卫权、重新探讨“无核三原则”、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以及强化日美对华战略协调，扩大

^① 参见：北岡伸一「積極の平和主義」に転換する日本の安全保障政策」。

^② 「第百九十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2016年1月22日、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20160122siseihousin.html。

与东南亚、澳大利亚以及印度等国的合作等。尤其是后一份报告，堪称为安倍政权量身定做，与其外交和安全政策基本吻合。

在历史问题上，安倍的言行令人忧虑。2013年12月26日，也是他再度出任首相一周年的纪念日。就在这一天，他选择了去靖国神社正式参拜。在参拜后，安倍随即抛出了早已拟好的“首相讲话”，列出几条理由来为其行为辩护：第一，哀悼与尊崇为国牺牲的“英灵”；第二，向“英灵”汇报政权一年来的表现；第三，无意伤害受害国人民的感情；第四，对参拜靖国神社演变为政治与外交问题表示遗憾。其真实意图，是通过“宣泄”来抒发日本面对大国志向与严峻现实割裂所产生的焦虑和愤懑；通过“致敬”去力图打造一个“有言必行”的强有力政治家形象，以唤起保守舆论的支持，进一步巩固执政基础。

同样在历史问题上，“安倍谈话”也受到日本国内外的强烈关注。2015年7月，由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日本政治外交史研究专家三谷太一郎与明治大学特聘教授、国际法专家大沼保昭发起，与日本国际政治学、历史学及国际法学的70余名学者共同发表《关于战后70周年首相谈话的声明》，主张“安倍谈话”应深思熟虑，对70年前违反国际法的侵略战争表示反省和道歉。8月14日，日本内阁正式通过了“安倍谈话”。从“谈话”文本上看，尽管使用的语境暧昧，但侵略、殖民统治、反省、道歉等关键词仍被写入其中，在字面上部分地延续了“村山谈话”和“小泉谈话”。但不能不看到，“安倍谈话”是欠缺诚意的“反省”，在诸多重要表述上存在问题。究其根源，“谈话”是日本国内外各方力量反复磨合的产物，也是安倍政权主动设定与选择的结果，重在从侧面为当前最为棘手的安全政策扫除障碍，以更快实现“摆脱战后体制”的目标定位。就在“谈话”公布的第二天，日本正式迎来了战败纪念日。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国战歿者追悼仪式上，天皇在致辞中首次使用了“对上次大战进行深刻反省”的表述，被认为是对安倍的牵制。“安倍谈话”，充分表明了其以“机会主义”的变通方式实现“修正主义”目标的真实逻辑。

在日美同盟问题上，安倍2015年访美期间，日美两国首脑围绕新安全合作框架达成多项共识，以构建可灵活应对安全环境变化的体制。4月27日，在日美外长及防长会议上就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取得一致意见。修订后的指针，重在扩充合作内容及活动范围，旨在将自卫队和美军的合作扩大到全球层面。1997年制定的指针将日本的安全环境划分为“平时”、“周

边事态”及“有事”，新指针则进一步明确了两国从平时到战时的合作规程，在此后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安倍就新指针表示，“这是强化日美同盟威慑力和应对力的指针，展现了21世纪强有力的盟友姿态。”总之，安倍政权致力于强化日美同盟，其真实意图在“借船出海”。在其战略棋盘中，既借力美国，更重提升自我实力，最终目标是趁势发展和摆脱束缚，全面迈向“正常国家”。当然，在实施这一战略目标时，日本将持续审视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及对外战略的变化，适时做出新的调整。

在修改宪法问题上，尽管安倍仍未公布具体的时间表，但在关于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决议中，已明确称“日本国宪法从施行起到今日，围绕我国的安全保障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变化在不断继续，我国面临着复杂重大的国家安全保障问题。”宪法第九条尽管规定“放弃战争”、“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但随着与美国同盟关系的巩固，条款和实际情况渐行渐远。目前，安倍一极“独强”的体制已较为稳固，自民党内依附安倍的动向更加明显。作为第一目标，安倍拟先解决自民党总裁任期延长问题，以便给未来可能的修宪留出足够空间。

在经济外交上，近期日本动向较为积极。安倍政府一直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问题视为日本的重要课题之一，因此尽管美国局势生变，新任总统在多大程度上支持还是未知数，但日本仍在众院全体会议上凭借执政党和日本维新会的多数赞成批准了TPP相关法案。对此，安倍表示：“在美国处于政权交接过渡期的当下，必须由我国来主导，使之尽早生效。”他再次强调日本将促使美国最终批准相关法案。^①日本政府的相关举措，也被认为是外交自主的表现。

当前，日本外交将着眼于三个政策选项：继续依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适应中国的崛起，采取更加自主的外交政策。这三个选项中日本最终会选哪个，抑或把三者相结合，取决于日本对全球力量均势的估计，而不是美国向它做出形式上的承诺，也取决于日本对事态发展的基本趋势的看法。如果日本看到它所在的地区乃至全世界正在出现新的力量布局，它就会根据自己对现实的判断，而非传统的同盟关系，设法加强自己的安全。因此，日本政府如何选择要看它认为美国的亚洲政策可信度有多高，以及它对总体力量的评

^① 共同社2016年11月14日电。

估。其中关键的因素不仅是日本的分析，还有美国外交政策的长期走向。^①

在日本外交界，除了日美同盟之外，如何与中国相处成为普遍关注的焦点。早在2011年，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曾就“什么是今后国际形势中最重要的问题”开展大型调研项目，有60%的人回答是中国，如果加上“新兴国”（中国也是其中重要一员），这一比率将会更高。^②原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藪中三十二指出，从现在必须考虑的是如何与中国打交道。^③在日本外交界具有较高威望的绪方贞子的话更发人深思，她认为：“对日本外交来说，最重要的课题还是中国。如何与中国相处，这其实是日本如何选择与自己这个国家相处的问题。在历史上，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就源远流长，日本是通过中国来看世界。与中国关系的稳定对东亚乃至整个世界都有利。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并不可怕。”^④

从中长期看，日本外交将面临四大课题：其一、经济中心还是军事崛起？其二、入美还是入亚？其三、自主还是结盟（与谁结盟）？其四、如何与崛起的中国相处？可以预计，今后的日本国内外外交战略论争，亦将紧密围绕上述“世纪性”课题来展开。1966年，高坂正尧在其名著《国际政治——恐怖与希望》中指出，战前日本外交的失败，根源在于日本人的国际政治臆想与国际政治现实的背离。^⑤在《自省录》一书中，中曾根康弘则认为，以战前的日本外交，特别是战争前后的外交为鉴，日本外交应将下述四原则作为基准：不做超出国力之事；外交不能搞赌博，更不能孤注一掷；内政与外交不能相互利用；必须顺应世界的潮流。^⑥外交是实现对外政策的工具，更是和平、发展与协调的艺术。在新的历史时期，能否从上述箴言中找寻到“外交的感觉”，将考验日本外交界的智慧。

（责任编辑：陈志瑞）

① 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第244—245页。

② 参见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调查组「焦点：创刊600号纪念特集日本外交を考える」、《国際問題》、2011年4月。

③ 藪中三十二「日本の針路——ヒントは交隣外交の歴史にあり」、岩波書店、2015年、第166—167页。

④ 野林健、納家政嗣編『聞き書 緒方貞子回顧録』、岩波書店、2015年、第290页。

⑤ 高坂正尧『国際政治——恐怖と希望』、中央公論新社、1966年、第7页。

⑥ 中曾根康弘『自省録』、新潮社、2004年、第29页。